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刘泾 吴绎如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一系列代表中华文明精髓、彰显民族精神特质，并能被广泛认知的符号系统。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对内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对外能够在清晰展示中华文明独特魅力的同时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战略举措。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一个多维度的文明符号系统——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作为世界文明图谱中未曾中断过的原生文明体，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凝结了众多文明标识，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不仅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标识，也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提供重要文化资源。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主要涵盖物质、精神、制度三个维度，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符号谱系：

物质文明标识体系是中华文明的符号化、外延式呈现，重在“形”。它是那些承载着中华文明历史信息、科技艺术成就和百姓生活方式的有形实体。玉器、青铜器、丝绸是中华文明的物质标识，体现了精湛的物质成就与深厚的精神内涵；黄帝陵、天坛、莫高窟是中华文明的历史标识，展现了丰富的历史遗产与恢宏的文化气象；黄河、长江、喜马拉雅山等自然景观是中华文明的地理标识，象征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坚韧品格与不屈的民族意志。

精神文明标识体系是中华文明价值伦理、审美情趣的彰显，重在“魂”。语言文字、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天文历法、书法绘画、小说戏曲、节庆民俗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呈现的人文精神、思想观念与道德规范，蕴含着中华文明丰富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这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主要涵盖物质、精神、制度三个维度，承载着文化识别、文化传承和文明交流的三重文化使命

制度文明标识体系涵盖许多具有开创性和深远影响的制度设计与实践，侧重“骨架”与“经脉”，是支撑“形”与“魂”、保障文明生生不息的治理结构与运行规则。追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国家制度等，是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一系列制度汲取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人文精神和民本主义价值取向，并在新时代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等思想文化资源，向世界展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承载着三重文化使命——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体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精髓，承载着文化识别、文化传承和文明交流的三重文化使命。

文化识别，回答“我们是谁”。文化识别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逻辑起点。文化识别是在共时性的维度上，通过一套精粹而独特的文化符号系统界定文化身份，回答“我们是谁”的根本问题。这就需要从中华文明浩瀚的文化宝库中，提炼、筛选和界定那些最能体现我们民族独特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哲学思想的标志性符号与理念，从而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独特

坐标。如最能代表中华文明特质的符号：长城、故宫、天坛等物质标识，书法、京剧等非物质标识，“仁爱”“和合”“自强不息”等精神标识，并将其系统化、标识化。通过这些独特的文化标识，强化中华民族成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文化传承，回答“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对中华文明赓续规律的深刻把握。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脉络，确保文明基因的代代相传与创新发展。这就需要系统保护和研究历史文化遗产，将散见于典籍、文物、习俗中的文明精髓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符号载体。通过阐释、活化，实现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明基因在代际传承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如“大一统”这一文明标识，既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鲜明见证，也是各族人民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文明交流，回答“我们与世界如何相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不同文明在标识建构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共性规律，但又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面对全球治理中的价值裂痕与文明隔阂，中华文明蕴含的“和合共生”的包容精神、“和而不同”的互鉴态度、“差异共存”的辩证思维，以东方智慧回应人类文明命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化解文明冲突的中国方案。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作为自身特性的核心表达，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的重要载体，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直观点，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中鲜明地树立起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文化坐标。要重视基于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推动跨文明对话与和平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需要多元路径协同推进——

深化理论研究，夯实体系根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需推进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传播学等多学科交流合作，深入挖掘、提炼并整合中华文明核心理念与元素，加大对中华文明特性的体系化、学理化阐释力度。通过对中华文化元素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古今交融、互补共生的当代中华文明图景。如“龙图腾”象征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品格、“仁、义、礼、智、信”体现出来的人文关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所蕴含的生态智慧等，都能够在这一标识体系中得到生动表达。

创新话语表达，改进传播方式。要运用现代科技(如数字博物馆)、艺术形式(如舞蹈诗剧)、传播手段(如文创)等，在各类文化活动中持续、连贯地植入中华文明标识，利用现代技术立体化、场景化地展现文明标识，实现全方位、沉浸式文化传播。要进一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中的文字，以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方式“活”起来、“火”起来、“潮”起来。

融入全球叙事，提升国际影响力。要挖掘中外文化共通点，寻找中华文化与其他文明的共情点，推广“小故事”模式，用具体而微、真实感人的故事，生动展现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引发全球受众的情感共鸣。要重视分享关于社会治理、生态保护、人际伦理等方面的独特方案，实现中华文明价值理念的柔性传播，提升中华文明的国际能见度，让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百花园中散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作者分别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社科教研部教授、研究生)



和批判，揭露其理论缺陷和实践危害，引导学生提升理论鉴别力。要讲清楚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阐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制度逻辑，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必然性、优越性，讲清楚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

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一个基础性工程是通过抓好核心教材、编好主干教材、开发新形态教材等，完善中国特色法学教材体系。这不仅是提升法学教育质量、培养德才兼备法治人才的关键环节，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在要求。

先看完善中国特色法学教材体系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法学教材承载知识传承、价值塑造、人才培养等多重功能。法学教材体系的完备程度，直接影响法治人才培养的质量，在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上，完善中国特色法学教材体系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是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重要工具。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新境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新局面，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完善中国特色法学教材体系，首要任务是全面、系统、准确地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融入教材编写全过程、各环节，使之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确保法学教育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培养造就一批又一批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高素质法治人才。

二是为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关键支撑。自主知识体系通常由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教材体系和话语体系四个方面组成。完善中国特色法学教材体系是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一个国家的法学教材体系，理应是其法治发展道路、法治实践经验和法治理论成果的集中体现。应当看到，中国法学教材建设中曾不同程度存在对西方法学理论简单移植、概念套用、话语依赖的现象，导致一些法学概念、范畴、原理与中国法治实践存在脱节。完善中国特色法学教材体系需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法治大地，提炼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标识性概念和理论范畴，系统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制度、法治文化的独特优势和内在逻辑。这不仅是法学知识生产的自我革命，更是构建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奠基工程。往更深层次看，只有建立与完善自主的法学教材体系，才能使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经验上升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成果，为世界法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

三是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提供知识载体。法治人才培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教材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一套科学权威、前沿实用的法学教材体系能够帮助学生夯实法学理论基础、掌握法律专业技能、拓宽国际法治视野、塑造高尚职业伦理。完善中国特色法学教材体系应当主动回应时代之需、实践之问，推动教材内容与时代俱进，及时反映立法最新成果、司法改革动态、法治实践经验，强化案例教学和实践导向，打破理论与实践脱节的藩篱。同时，法学教材在传播法学知识的同时，还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职业伦理、涵养法治精神、恪守职业道德、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再看完善中国特色法学教材体系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法学教材体系不是对现有教材的简单修补或国外教材的翻译引进，而是一个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统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系统集成、守正创新的知识系统。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政治性是法学学科的鲜明特征。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教材编写全过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法律现象的本质与发展规律，揭示法律作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内在关联，避免陷入纯粹规范分析或价值中立的误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思潮，特别是对西方所谓“宪政”“多党制”等错误思潮、错误观点进行深入剖析

二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法学教育要处理好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完善中国特色法学教材体系既要注重法学基本概念、原理和制度的阐释，又要加强对典型案例、立法动态、司法改革、法治实践最新发展的分析。可鼓励将“中国法治故事”“中国司法案例”有机融入教材。比如，在编写刑法教材阐述正当防卫时，除了讲清楚其概念内涵、法理基础外，还可以融入一些司法案例，让学生在生动鲜活的法治情境中理解抽象的原理，使理论教学有温度、有深度、有说服力。

三是坚持规范统一与特色发展。对于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学、刑法学等涉及法学核心课程，应组织全国权威力量编写示范性教材，确保基本知识、基本观点的规范性和统一性。同时，鼓励各高校、科研机构结合自身学科优势、地域特色和科研专长，编写具有特色的校本教材，形成“一主多元”、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

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法学教材体系应当覆盖法学各主干学科和重要领域，形成核心教材、辅助教材、案例教材等相互支撑的构建系列。此外，还可针对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等不同学历层次以及理论型、应用型等不同培养目标，编写侧重点和难度不同的教材，体现分类指导、因材施教。

接着看完善中国特色法学教材体系的实施路径。

一是加强统筹规划与宏观指导。教育主管部门、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等应当发挥主导作用，研究制定新时代法学教材体系建设的中长期规划，明确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点领域和实施步骤。注重打破学科壁垒和部门分割，建立法学教材建设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实施部门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确保教材内容紧跟法治实践前沿。建立健全法学教材编写、审核、选用、评价、更新的工作机制和管理规范。设立国家级法学教材研究基地和重点编写项目，给予专项支持。

二是汇聚高水平编写团队，强化集体攻关。组建由理论界和实务界专家共同参与的编写团队，使教材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贯通。特别要发挥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的带动作用，集中力量编写一批代表国家水平、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核心教材、标杆教材。编写团队既要有在法学各领域具有深厚造诣的领军学者，也要吸纳长期从事法学一线教学的中青年骨干教师，使教材内容既能保持理论深度和学术规范性，又能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和课堂实际需求。

三是创新教材形态与呈现方式。顺应信息化、数字化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纸质教材内容固定、形式单一的局限性，推动纸质教材与在线资源深度融合，形成“纸数一体、线上线下联动”的新型教学载体，建设配套的案例库、法规库、教学视频、虚拟仿真实验等数字化资源，助力实现学习场景的泛在化与个性化。探索开发交互式、智能化的法学教材，利用大数据分析、知识图谱等技术手段，实现学习进度的智能诊断、疑难知识点的精准推送、虚拟法律场景的沉浸式体验，提升教材的吸引力、互动性和教学效果。

四是建立健全动态修订与评价反馈机制。法治在发展，理论在创新，教材必须与时俱进。建立常态化的教材内容更新机制，及时将重要的立法修改、司法解释、政策文件和理论成果纳入教材，确保教材内容保持时效性与权威性。同时，构建教材使用评价体系，广泛收集教师、学生和实务部门的反馈意见，作为教材修订的重要依据。(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

完善中国特色法学教材体系



在“词元”中透视智能经济

李蔚

“词元”(英文为Token)，即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不仅是智能时代的价值锚点，更是连接技术供给与商业需求的结算单位。它可以使人工智能从一种难以捉摸、边界模糊的技术能力，转变为一种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新型数字资产和标准化生产要素。

站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节点，上海正以人工智能等三大先导产业为牵引，统筹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深入理解“词元”的经济内涵和机遇价值，率先探索其发展路径，不仅是一项前瞻性的理论课题，更是抢占智能经济新赛道的战略抉择。

“词元经济”

从技术层面看，词元是人工智能处理信息的“最小颗粒度”。面对一段文本，人工智能模型并非按“字”或“词”来读取，而是将其切分为若干可计算的最小单元——词元。根据不同模型的切分规则，一个词元可能是一个标点、一个词组，也可能只是半个单词或一个词根。在输出环节，模型同样以词元为单位进行循环预测，最终“拼装”出完整的反馈。形象地说，词元就是大模型理解世界、组织语言、生成结果的底层“积木块”。

在技术语境下，词元只是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但当人工智能走出实验室、走向产业和市场之后，词元进一步获得可定价、可交易的经济属性。每一轮与大模型的对话，每一次让人工智能助理编写代码或生成报表，背后都是成千上万个词元的消耗和计算。如果把人工智能比作驱动新经济的引擎，那么词元就是这台引擎消耗的燃料。

近年来，词元开始像电力、网络、算力一样，成为人工智能运行所依赖的一种基础性投入。全球主流大模型及其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的商业模式，均已确立按输入和输出词元数量计费的标准模式。词元不再只是一个技术参数，而逐步成为智能服务的计量单位、计价单位乃至结算单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词元经济”可以被理解为：以词元的生产、分发、调用、计价、交易和治理为核心的一整套新型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组织逻辑。它正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维度上推动新型生产方式的形成：

从生产力的维度看，词元正成为智能时代重要的生产效率标尺。芯片、算力、电力、数据等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发生深刻转变，其目标不再是简单的存储或计算，而是规模化、高效率地生产高质量词元。换言之，提升每单位时间、每单位能耗的有效词元产出日益成为生产资料重新组合的目标和衡量智能生产力的指标。2025年初，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中国大模型之所以轰动世界，正是因为通过算法创新大幅提高“词元生产效率”——用更少算力、更低成本，产出同等甚至更高质量的词元。

从生产关系维度看，围绕词元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正形成一套新形态。在生产环节，企业开始将词元消耗与产出榜单作为衡量员工效率的新标尺，说明人工智能更深入地嵌入劳动过程；在交换环节，词元定价的普及标志着人工智能能力转化为标准化的可交易商品，并正形成一个打破地域限制的全球化“词元交易市场”和竞争格局。全球公开模型API聚合平台OpenRouter的公开排名显示，按实际交易产生的词元调用量计算，中国的代表性模型连续多周超越美国、领跑世界。在分配环节，“词元配额”开始被部分硅谷科技公司作为新型福利发放，未来甚至可能嵌入薪酬体系，预示分配方式的演变；在消费环节，词元消耗深度嵌入研发、制造、金融等核心生产活动乃至个人日常的人工智能应用中，OpenClaw等自主智能体的爆发更是掀起全社会的词元消费热潮。

可以说，“词元经济”勾勒出的不仅是一个前沿技术名词，更是一幅徐徐展开的经济运行新图景。

智能经济新形态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智能经济新形态”概念与“十五五”规划部署的“人工智能+”行动形成战略呼应——抓住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拓展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广度和深度，以进一步打开经济持续增长的新空间。词元与词元经济正是赋能智能经济新形态的重要切入点。

一是激活智能经济新型要素的配置方式。

智能经济强调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但数据是静态的、潜在的资源。只有通过人工智能的加工、处理、输出，才能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词元恰恰对应了这一转化过程：它既度量了数据被活化的程度，也度量了智能服务被投入和消耗的规模。

过去，从“数据要素”到“智能产出”之间缺少统一、可计量的中间环节。词元的出现，为数据价值的释放提供了可量化交易的现实路径。“十五五”时期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化数据资源开发，有了一个新的重要抓手。

二是强化智能经济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方向。

传统基础设施各有其核心衡量指标，如交通看运力、能源看电力、通信看带宽。在智能经济中，词元的生成速度、分发时延、调用成本将越来越成为衡量基础设施质量的关键标尺。

新形势下，要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强全国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支持公共云发展。词元视角揭示了这一布局的深层逻辑：智算集群解决词元的“规模化生产”，算电协同解决词元的“低成本供给”，一体化调度解决词元的“跨区域流通”，公共云则解决词元的“普惠化接入”。只有让词元能够像电力一样便捷获取，智能经济的潜力才能真正从算力中心释放到千行百业。

三是推动智能经济新型产业生态与组织方式的形成。

过去，人工智能商业化往往面临定价困难、预算不清、难以形成商业闭环等问题。随着词元让人工智能可以按调用量、输出量、服务质量进行更精细的核算与交易，企业得以更清晰地开展成本核算、投入决策和收益评估，为商业场景投资和价值实现提供较为明确的衡量标尺。这将有助于“人工智能+”在千行百业加快落地，推动重点行业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并催生智能原生的新业态、新模式。

与此同时，随着智能体等新应用形态的发展，越来越多任务将由“数字员工”执行，词元也将成为资源消耗和价值计量的重要尺度。这不仅会改变企业内部的结构、流程设计和管理方式，也可能重塑企业之间的分工关系与组织边界，甚至带来产业转型

升级，以及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成长空间。

抢抓新机遇

在围绕人工智能的全球博弈中，词元正成为新的战略资源。抢抓词元战略机遇，构建词元生态体系、打造以词元为核心引擎的智能经济新优势，既是时代赋予中国的重大命题，也是上海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必须率先探索的战略使命。

新时代新征程，锚定词元与词元经济，上海如何将技术优势、产业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智能经济新形态的综合竞争力？

第一，打造“词元生产率”的技术高地。将提升单位能耗和单位时间的词元产出作为技术攻关的重要方向，聚焦芯片设计、模型优化等关键环节，支持企业提升词元生产效率。建设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绿色智能算力基础设施，推动上海成为高质量词元供给的重要技术高地。

第二，构建“词元流通”的全球枢纽。依托上海数据交易所、自贸试验区建设，探索词元相关服务的定价、结算、交易和合规机制，探索建立面向全球的词元交易平台。研究词元的跨境流动规则，推动上海成为全球词元定价与结算的中心节点。

第三，培育“词元消费”的标杆场景。场景是词元价值实现的关键，上海的产业优势有利于形成一批高价值、高频次、可复制的示范场景。比如，在金融领域将词元消耗纳入核心运营指标，探索智能风控等领域的词元计费模式，并尝试以“词元消费券”等工具激励高价值应用。

第四，完善“词元治理”的制度供给。上海应当充分发挥改革开放前沿和制度创新高地的优势，率先探索词元相关的确权、交易、监管和统计规则，为全国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制度样本。

词元虽小，却折射出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若能充分发挥科创优势、产业优势、开放优势和制度优势，上海完全可以抓住词元经济的机遇，先行一步、形成示范，为全国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贡献更具引领性的方案。

(作者单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经济学教研分部)